

社会人类学丛刊

王铭铭 主编

历史、物质性 与遗产

十四个人类学讲座

〔英〕迈克尔·罗兰 (Michael Rowlands) 著
汤芸 张原 编译

后浪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社会人类学丛刊 王铭铭 主编

历史、物质性 与遗产

十四个人类学讲座

[英] 迈克尔·罗利 (Michael Rowlands) 著
汤芸 张原 编译

后浪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历史、物质性与遗产：十四个人类学讲座 / (英)迈克尔·罗兰著；汤芸，张原编译. —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6.9

(社会人类学丛刊)

ISBN 978-7-5502-8620-7

I. ①历… II. ①迈… ②汤… ③张… III. ①人类学—文集 IV. ①Q98-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24753 号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6 POST WAVE PUBLISHING CONSULTING(Beijing) Co., Ltd.

本书中文简体版权归属于后浪出版咨询(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历史、物质性与遗产：十四个人类学讲座

著 者：[英]迈克尔·罗兰

编 译：汤 芸 张 原

选题策划：后浪出版公司

特约编辑：沙芳洲

责任编辑：夏应鹏

营销推广：ONEBOOK

装帧制造：墨白空间·韩 凝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83 号楼 9 层 100088)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06 千字 690 毫米 × 960 毫米 1/16 15 印张 插页 4

2016 年 1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02-8620-7

定价：32.00 元

后浪出版咨询(北京)有限责任公司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周天晖 copyright@hinabook.com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电话：010-64010019

自序

多年前，当我开始在伦敦大学学院攻读人类学学位时，正值英国社会人类学的转型时期。那时，主流的结构-功能主义正在饱受批评，因而我在求学时期也大多是追寻着结构主义的抽象逻辑，以及从结构语言学中提取出来的模式及其变形。然而，由于我曾长期接受考古发掘的训练，且总觉得考古学与人类学之间有着长久深远的交流，所以我对人类学的老师们总把时间、历史与考古学剔除在外而感到失望。毕竟伦敦大学学院曾经不仅是由史密斯（Grafton Smith）和佩里（W. J. Perry）所引领的早期传播论的基地，也是超越传播论的知识阵地。而我也深深痴迷于那种关于文化起源与文明差异的宏大叙述。

事实上，在我的学生时代，英国社会人类学界在民族学式与社会学式的文化现象研究的路径之间就已经制造了一种紧张关系。1923年，英国社会人类学开创者之一的拉德克利夫-布朗（A. R. Radcliffe-Brown）曾在他那篇开创性的文章之中指出，民族学（不论是在德国、英国或美国）是以历史的、具体的路径来解释文化多元性；而新型的社会人类学则应该是一门不考虑历史的、比较性的及普遍性的研究社会系统的自然科学。这一论断导致的后果众所周知，即在英国的民族学与社会人类学之间产生了巨大的鸿沟。于是，人类学界开始特别排斥那种基于博物馆与物质文化的收藏而展开的研究，并称这类研究为“摇椅上的人类学”。法国将社会学的方法引入人类学，也被认为不及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所引领的人类学改革重要。20世纪60年代，列维-斯特劳斯创立了社会人类学研究实验室（Laboratoire d'Anthropologie Sociale），与莫斯（Marcel Mauss）和列维-布留尔（Levy-Bruhl）

于1927年创立的民族学所(Institute of Ethnology)相抗衡,同时也区别于安德烈·雷奥-格尔汉(Andre Leroi-Gourhan)所提倡的那种综合民族学与考古学,且极为关注身体与文化技术中的技艺的人类学研究。而在我的人类学生涯中,我也不断致力于重建一种平台,一种我觉得是在欧洲的民族学与社会人类学的对峙中逐渐瓦解了的平台。不过,我发现在这一过程中,在与基于“田野工作”的“乡村研究”式的社会人类学的对峙中,至20世纪70年代,北欧与西欧的民族学自身也在转型,逐渐转向奥尔韦·勒夫格伦(Orvar Lofgren)所说的那种“以小为美”的研究范式。克里斯蒂安·布隆贝热(Christian Bromberger)描述了法国的民族学的转变,认为其研究同样经历了类似的从大规模向小规模的模式转向。勒夫格伦还描述了20世纪70年代瑞典的民族学,称其逐渐沉迷于研究“细微事物”以及日常生活的物品,而不再如早先一般关注找寻物质文化的大范围传播证据,以描绘传播与革新的趋势,或探寻长时段中的社会演化模式。随着文化圈理论在德国与斯堪的纳维亚的销声匿迹,对细微事物的沉迷也随之终结。于是,大话题重新出现,提出“文化建构”(culture building)以承认民族文化的多元性,并且更为重要的在于对物品的研究挑战了人类学主流的注重语言的研究模式,更赋予了物质性这一概念以新的视角。这一挑战点明了物质文化不只是物品研究中的微不足道的主题,而是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它们自身并非不重要。如丹尼尔·米勒(Daniel Miller)所称的“物品的谦卑”(the humility of objects)并非因为物品显而易见且受到制约,而是因为我们没有“看见”(see)它们。我们对自身所处物质环境的认识太少,而物品对于我们确立毋庸置疑的规则却极为重要。这也有助于解释,在一个以言说/语言为主导的学科中,为何如此多的人类学家都轻视物质文化研究,认为其过于细琐或缺少大问题。

直至20世纪80年代,欧美人类学发生转变,不再漠视物质文化。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实践理论大纲》(*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一书便是这一转变的开拓之作。在书中,布迪厄呈现了物品何以能被视为人们被社会化为社会存在所需依托的首要方式,比如说,孩子们的社会化过程,在进入语言阶段之前,即是借助物质世界中的物品而实现的。他所

提出的“惯习”(habitus)概念不断涉及物质文化所创造的日常生活之秩序,甚至终极真理之理想。阿帕杜莱(Arjun Appadurai)在其《物的社会生活》(*Social Life of Things*)一书中,通过礼物与商品所具有的同化与异化的双重性,思考了物品在社会中的作用。米勒则在其《物质文化与大众消费》(*Material Culture and Mass Consumption*)一书中,提出客体化的理论:人们乃是通过获得与使用物质文化的行为,从而将自身客体化。而有关能动性与人物的讨论,则是阿尔弗雷德·吉尔(Alfred Gell)的《艺术与能动性》(*Art and Agency*),以及拉图尔(Bruno Latour)的《我们从未现代过》(*We Have Never Been Modern*)的聚集点。这两本书都提倡一种实践的理论:人们如何借助于物品而造物、行事。在拉图尔看来,在行动者与物品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区分,并提出对行动元(actants)及事实拜物教(factishes)的研究。他批评涂尔干式的对社会的定义是一种基于欧洲中心主义式的主客二分的定义,这样的定义引发了对科学的迷信,且认为自然与社会都是独立于非人世界的,或者说仅存在着一个被动地由人类世界赋予秩序的物质世界。这样的反思不仅在人类学界,还在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界引发了思考。吉尔更进一步讨论了物的能动性是如何被认为不及关于人的理论重要的,而人们正是通过对物的作用来创造身份认同的。这样的观点认为物品中所内嵌的人的能动性,不仅在于人们制造了物品,更在于通过占有与迷恋的行为,物品也在制造着人。这或许也是人类学关于社会能动性的讨论中流传最为广泛的核心观点。

基于这样的知识背景,我很荣幸地接受了北京大学教授、时任中央民族大学特聘教授的王铭铭先生的邀请,于2006年第一次来到中国参加“物质文化的人类学暨第一届人类学研习营”,并做了有关物质文化的发言。如大家所知道的,我的人类学视角其实极大地被欧美传统所形塑,而且我的研究也多在西非展开。而我在发言中极力呈现这样一种物质文化的视野:汲取当代有关物质性的所有讨论,同时也能充分借鉴对历史有考究的欧洲民族学传统。我力图表明物质、物品同样是形塑与确立文化认同的传播过程的一部分。我有些不安,不知来自中国各所高校的博士研究生们是否会欣赏这一观点。

不过,我发现我的听众们其实已经开始认识到这一观点。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我多次受邀前来中国举办讲座,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我发现中国的学术环境正是我在伦敦读研究生时所期望的,因为在中国的人类学史中,欧洲式的民族学与社会人类学之争并非其核心,相反,物质文化的作用以及对“深远过去”(deep past)的感知,已然深嵌于人类学的传统之中。我非常感谢王铭铭教授在中国出版我的这本讲演集的设想和提议,也感谢汤芸和张原副教授将这些文章(有的已经发表于各种中文期刊之中)收集整理成册,以及汤芸副教授、张力生博士候选人、梁永佳教授、刘雪婷女士、阿嘎左诗博士、刘源博士、卞思梅博士候选人等人为我近十年来各篇讲演稿的翻译所付出的辛苦。本讲演集的出版,是我与以上诸位间相互的激发与对话的呈现,也是向中国人类学界介绍我的研究的努力中最值得纪念之事件。

迈克尔·罗兰

编译者说明

罗兰 (Michael Rowlands) 教授, 是人类学和物质文化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之一。1972年, 获得伦敦大学考古学博士学位后, 罗兰至伦敦大学学院任人类学讲师, 后于1992年成为物质文化研究教授, 亦曾担任伦敦大学学院人类学系主任。作为一位卓有建树的人类学家, 罗兰教授的物质文化研究始于其早期考古学的训练。自博士论文的研究开始, 他便结合考古材料与人类学理论, 关注长时段社会变迁过程中的物质文化。与其所处时代的许多英国人类学家一样, 罗兰将自己的田野考察地域放在了人类学经典田野研究区域——非洲大陆。1976年, 他深入非洲西部喀麦隆的草原地区进行了15个月的田野考察, 聚焦于技术、器物与交换等话题。之后, 他不断在非洲各地开展田野工作, 研究议题不仅涉及技术、器物、仪式、巫术、消费与现代性、木材的地方性生产-消费链条等具体问题, 也在理论方法上汲取莫斯 (Marcel Mauss) 有关文明的论述, 从而突破了民族、国家与区域的视野局限, 来探讨非洲作为一种文明的可能, 并开启了其对各种文明体系的比较研究工作。罗兰教授的学术成果丰富, 其主要著作包括《考古学中的社会转型》(*Social Transformations in Archaeology*, 1998)、《购物、地方与认同》(*Shopping, Place and Identity*, 1998)、《物质文化研究手册》(*A Handbook of Material Culture*, 2006) 等, 代表论文有《喀麦隆的巫术、力量与现代国家》(*Sorcery, Power and the Modern State in Cameroon*, 1988)、《欧洲青铜时代的消费与认同》(*Consumption and Identity in the European Bronze Age*, 1998)、《为了遗忘而记住: 作为献祭的战争纪念》(*Remembering to forget: War Memorials as Sacrifice*, 1999)、《马里与喀

麦隆的文化遗产以及知识分子的作用》(Cultural Heritage and the Role of Intellectuals in Mali and Cameroon, 2002)、《建立人类学与考古学的关联》(Relating Anthropology and Archaeology, 2004)、《探讨物质性的物质化路径》(A Materialist approach to Materiality, 2005)等。罗兰教授曾任《物质文化》(Material Culture)期刊主编,并曾担任世界考古学会主席及英国皇家人类学学会学术委员,在国际学界享有很高的声望。

结缘于2006年在贵阳花溪举行的“物质文化人类学暨第一届人类学研习营”活动,近十年来,罗兰教授与国内人类学界的学术互动紧密。2007年6月,基于与北京大学王铭铭教授关于文明与人类学的讨论,罗兰教授和著名汉学人类学家王斯福(Stephan Feuchtwang)教授受邀参与北京的“文明的人类学探究”讲习班,共同作了六场以文明、人类学、民族学、物质性、长时段为议题的讲座。罗兰在讲座中同国内学者分享了他多年来对“物”与“文”之关系的思考。^①

在这近十年间的频繁交流中,罗兰教授同中国学者一道在“文明”“物质性”等领域展开了一系列深入的对话讨论与研究探讨,为近年来汉语人类学“文明研究”之兴起做出了很大贡献。

本论文集共收录十四篇讲演稿与一篇附录。这十四篇讲演稿,是罗兰教授于2006年至2014年间,在中国北京、成都、泉州、贵阳、大理多地参加会议、举办讲座、参与国家外专局项目^②的主要论文与讲稿的译稿。讲演稿后所附的,是对罗兰教授的一篇学术专访,大致呈现了罗兰的学术经历与研究理路。这些讲演稿与访谈稿的翻译校订工作,多为北大蒙养山学社和西南民族大学他山学社的年轻学人所承担,部分论文曾刊载于《中国人类学评论》《西南民族大学学报》《民族学刊》《他山通讯》等学术期刊中。限于篇幅,这些文

① 罗兰教授的讲座促成了莫斯等人的经典文集《论技术、技艺与文明》在中国的翻译出版。见马塞尔·莫斯、爱弥尔·涂尔干、亨利·于贝尔:《论技术、技艺与文明》,纳丹·施郎格编选,蒙养山人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该书的翻译与出版过程见王铭铭在该书中撰写的“总序”。

② 即国家外国专家局2014年度外国文教专家项目:“博物馆与物质文化研究:中欧经验比较”(项目编号:2014-067)。罗兰教授受邀参与此项目,并于2014年11月于西南民族大学进行访问,举行学术讲座,参与学术活动。本文集的出版亦受此项目的支持。

章难能完整呈现罗兰教授深厚广博的理论视野与多元丰富的研究领域,不过,它们也尽显罗兰教授多年在长时段史的人类学、物质文化与博物馆研究等领域的研究心得。

围绕“历史、文明与人类学”的主题,本文集的上编收录了罗兰教授的七篇讲演稿。在这些论文中,罗兰教授在与中国学者的讨论之中,展开了对西方人类学文明研究之第二阶段的反思,并将人类学的文明探究推到了第三阶段:突破西方与非西方的文明/野蛮之二分,关注非西方世界的文明形态。^①罗兰的“文明观”最初展现于2007年“文明的人类学探究”讲习班上的三场层层推进的讲座。他在讲座中指出现代人类学在学科发展中虽经历了从民族学到人类学的转向,但人类学仍应延续民族学对大时空转型和长时段变迁的研究旨趣。特别在关于物质性(materiality)与文明一体性的研究中,民族学的方法对于重新思考人类学视野的局限是有裨益的。罗兰援引非洲的三个案例,进而提出“容器”与“人”的概念在非洲存在着紧密的联系,这使得整个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大陆形成了一种以“身体社会”为特征的、普同一体的文明形态和宇宙观图式,且这种大范围、长时段的宇宙观正是理解非洲作为一个文明整体的关键。因此他认为,人类学对历史的兴趣应在于“深层历史”(deep history)之考察,即探究长时段的延续与断裂。通过提出范围(scale)、物质性、时间性(temporality)三个核心概念,罗兰强调应将长时段的问题放置于一个开放的地区与网络场景中来理解,并在长时段中找寻塑造文化性情的文明模式和道德母题。通过与中国学者的讨论互动,罗兰于2009年将其思考进一步推进到文明的比较研究,以及宇宙观与宇宙秩序的讨论之上。他在“文明作为对照的宇宙秩序:西非与中国”的讲座中首次提出自创的概念:“宇宙秩序”(cosmocracies),以强调文明的本质是一种关于宇宙秩序的不同处理与表达方式。基于西非的田野经验,罗兰提炼出使得内部多元的非洲成

① 三个阶段的前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古典人类学时代的民族中心主义的历史论阶段;第二阶段则是在对历史论进行改造的过程中形成的相对的空间论,在野蛮与文明之间形成一种反民族中心主义的思想关系。详见王铭铭:“文明的人类学探究强化讲习班纪要”,载王铭铭主编:《中国人类学评论》(5),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8,196~205页。

为一个文明体的宇宙秩序，即在一种“可见之物”与“不可见之道”的区分基础上，以物质化的方式呈现“不可见之道”。他认为，这种宇宙秩序的逻辑同样适用于理解中国文明，只是其在中国有着不同的表现方式与深刻意义。经过几年的讨论与思考，这一观点终在2014年的“作为宇宙统治之比照的文明”讲座中得到更系统的阐述，他将“宇宙秩序”的内涵拓展为“宇宙统治”，以纳入政治与哲学维度，且更明确地将其定义为：处理混沌/失序的方式及其所表现的形态，并强调其是一个动态、长时段与大范围的概念。此外，针对西方学界长期将文明视为一种进化论式的结果之偏见，罗兰重新审视了新石器时代的界定与影响，并指出处于同一时期的非洲直至东南亚的岛屿上，并列形成了一个不同于“欧亚奇迹”之交流网络，于仪式与物质交流上呈现了一种既有相似性又有差异性的多重文明中心的世界格局。此一观点不仅是对之前那种暗含进化论的文明观之反思与批评，还开启了关于文明的另一类形态之讨论。可以说，深厚的考古学素养与广阔的人类学视野，以及对英国扎实的田野经验传统和法国深刻的理论比较风尚之综合，使得罗兰教授关于文明的人类学讨论充满了启发。

本文集的下编所收录的罗兰教授的七篇讲演稿，则聚焦于“物质性、遗产与博物馆”主题。因对物质性的理解存在分歧，当代物质文化研究被推向了两个相反的视野路径：一方强调物是社会文化语境的结果；一方则推崇物的绝对自主性。而罗兰教授对物质性的探讨却很难被归入任何一派，更非二者的折中。在文章中，他通过梳理欧洲关于物的态度及博物馆兴起的史，指出上述两派视野都不过只是基督教背景下欧洲知识论对主客的二分所带来的种种焦虑。借用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的“事实拜物教”（factishism）概念，罗兰教授进而指出欧洲陷入了一个认识论的困境：既然事实不同于拜物教，那人造之物何以获得超越性的神力？在这一困境下，欧洲人一方面消灭各地的偶像与拜物教；另一方面又以博物馆、遗产地、旅游景点等形式，创造出现代的拜物教。而通过非洲的民族志素材，罗兰教授指出，人造之物的自主性之获得在于仪式性的激活（activation）行为，或者说与献祭有关。这里所说的献祭，遵循的是莫斯基于身体技术而进行

的理解，即献祭是一种赋予生命与创造主体的行为，常与食用和供奉有关。通过献祭，人们借助于物来创造一种因果关系，并以吃/喂食等身体行为（包括血祭或共餐等）作为干预力量来弥合损失或激活物品。这些物及其技术便成为这一因果关系景象的物质化，或者说“之间性”的物质化与实现。于是通过各种献祭的技术，物与社会文化之间形成一种相互关系。同时更为重要的是，物的自主性也体现于文明内部的复合性与多元性之上。正是这样的物质文化研究视野，使得罗兰关于博物馆、遗产、记忆等议题的探讨有着更为深厚的理论思考与民族志意味。当然，除了从学理上梳理与反思西方学界有关这几个话题的理论脉络及困境之外，罗兰也强调技术革新所推进的一些转型。在与中国学界的讨论中，罗兰教授同样注重从中国的思想史与当代实践中找寻反思的力量，强调应用中国自身的概念去理解博物馆、遗产与物品。他认为“文物”正是中国对物件的理解框架，并指出《左传》对之的定义强调文物的重要性与传承意义在于其是仪式用品。除了文人的“盛世收藏”传统所保存与传递的文物之外，更重要的是存放具有仪式意味的文物之建筑——“庙”。罗兰认为，文物、收藏与庙这几个本土概念其实正蕴涵着中国经验对西方知识体系进行反思的可能，更是整个学界突破那些由欧洲自身观念史中所生发的相关概念而带来的认知束缚之关键。在罗兰看来，近年来多种形态的私人博物馆在中国的兴起，也标志着中国博物馆正朝着这样的反思与突破方向转型。

作为罗兰教授与中国学界进行深入学术对话和研究探讨之成果，收录于本文集中的讲演稿向中国学界集中展示了罗兰教授所专长的两个领域研究：“文明的人类学探究”及“物质文化与博物馆探讨”，从中可一窥英国人类学务实而又进取之风范，故特将这批论文编辑整理出版，以垂文明道。

在不同时期，罗兰教授的讲演稿有不同的译者和校对者，现将各篇文章的译者与校对者名单罗列于下：

从民族学到物质文化（再到民族学）	梁永佳 / 译
文明与非洲的一体性	刘雪婷 / 译
长时段过去和断裂	阿嘎佐诗 / 译
超越封闭文化：中国境外的文明、区域和长时段的延续与断裂	刘源、尼玛扎西 / 译，彭文斌 / 校
文明作为对照的宇宙秩序：西非与中国	张帆、汤芸 / 译
作为宇宙统治之比照的文明	张力生 / 译，张原 / 校
新石器化：从非洲到欧亚以及更远之处	张力生 / 译，汤芸 / 校
器物之用：物质性的人类学探究	张力生 / 译，汤芸 / 校
献祭行为：对世界“之间性”的物质化	田蕾、甘成凤 / 译，汤芸 / 校
遗产、记忆与后殖民时代的博物馆	汤芸、张原 / 译
对遗产与记忆的再思考	汤芸 / 译
重新定义博物馆中的物品：中国遗产的井喷	汤芸 / 译，彭文斌 / 校
中国的新博物馆时代到来了吗？	汤芸 / 译
“新型”民族志博物馆：数字化遗产技术、社区参与及文化还原	汤芸 / 译
附：物质文化与人类学： 英国人类学家迈克尔·罗兰专访	卞思梅 / 问，赵秀云 / 译

汤芸、张原
2015年8月7日

目 录

自 序	1
编者说明	5

上编 历史、文明与人类学

从民族学到物质文化（再到民族学）	3
文明与非洲的一体性	15
长时段过去和断裂	41
超越封闭文化：中国境外的文明、区域和长时段的延续与断裂	53
文明作为对照的宇宙秩序：西非与中国	65
作为宇宙统治之比照的文明	81
新石器化：从非洲到欧亚以及更远之处	95

下编 物质性、遗产与博物馆

器物之用：物质性的人类学探究	119
献祭行为：对世界“之间性”的物质化	131
遗产、记忆与后殖民时代的博物馆	145
对遗产与记忆的再思考	167
重新定义博物馆中的物品：中国遗产的井喷	181
中国的新博物馆时代到来了吗？	193
“新型”民族志博物馆：数字化遗产技术、社区参与及文化还原 ...	207
附录 物质文化与人类学：英国人类学家迈克尔·罗兰专访	215

上编 历史、文明与人类学

从民族学到物质文化（再到民族学）*